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 农业组织模式

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Model
Led by Peasant-Entrepreneurs:

The Technology and Market Evolution of Grape Industry in Tianxing Village

徐振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 农业组织模式

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



Th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Model
Led by Peasant-Entrepreneurs:

徐振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徐振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5097 - 1947 - 3

I. ①小… II. ①徐… III. ①葡萄—种植业—生产组织—研究—湖北省 IV. ①F32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859 号

小农—企业家主导的农业组织模式 ——天星村葡萄业技术与市场演化

著 者 / 徐振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徐小玖

责任校对 / 孟赤萍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4.6

字 数 / 22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47 - 3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徐振宇博士这本书写的是湖北一个村葡萄业组织模式的演化。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前言中说明，“本书并非要鸿篇巨制地研究一个带有最终结论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要探索自己心中存在的一个‘谜’，或曰命题”。

那他要探索的是什么“谜”呢？

我们知道，在发展以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为特点的现代农业时，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高度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农业同产前与产后部门（相关联的工商企业）通过经济上、组织上的结合，或通过相对稳定的业务联系，形成一种经营形式或经营系统，被称为现代大农业或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农业。农业的垂直一体化经营，依照农业关联企业 with 农民结合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可分为三种形式：①农业关联企业 with 农场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实体，构成农工商综合体。②合同制。农业关联企业 with 农场主签订合同，在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原有工商企业和农场仍保持各自独立的实体地位不变。③另一种替代的方式是农民组成合作社，直接参与到农业垂直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成为一体化的主体成分，“农民自己将农场生产的一些部门交给了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使农民的

合作社自身成为龙头企业。^①徐振宇博士想要解答的“谜”是：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没有正式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单凭自身的力量是否也能演化出有竞争力的农业？

作者以中国中部地区一个普通行政村（天星村）葡萄业的演化历程为例，对以上疑问作出了有一定前提条件的肯定回答，并且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归纳出的几种农业组织模式的一种自生自发的组织模式——几乎完全凭借一家一户小农自身的力量演化出颇具竞争力的农业。他剖析了这种一家一户分户经营的组织模式演化的内在运行机制，尤其是与葡萄业的起步、技术演化、市场范围扩展、流通组织演化相关的运行机制，指出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和模仿—学习机制始终扮演核心角色的模式。

作者的这种探索有什么意义呢？我想，通过对这种模式的实证研究和阐述，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真实的平凡世界里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可以为理解中国农业组织模式的演化历程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素材，丰富农业组织的模式类型，同时也为涉农政策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

作者是如何来解析他心中的疑问呢？这涉及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系毕业的管理学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该书几乎保持了作者博士论文的原貌。那他在研究上是否就必须只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呢？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到，“通过一个村庄的真实演化历程来剖析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梦想。反复阅读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后，我觉得我必须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以一个村庄为案例作博士学位论文，似乎向来都是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套路，极少有经济管理类

^① 张晓山：《创新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现代农业》，《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8期。

博士生这样做”。作者要研究的问题决定了该项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他在书中充分运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并适当借鉴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开展研究，在论述中运用了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法无定法，只要能回答提出的问题，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必拘泥于学科，更不要有门户之见。

作者在解答他心中的疑问时不是干巴巴地单纯运用数据、表格和死的资料，而是把他的观察、分析和研究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一个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故事，必然要求作者有较深厚的研究积淀和对现实的真切理解。作者提到，“本书不仅是我多年来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观察一个普通村庄的结果，也是我长期亲身体会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的结果。……我对所研究的天星村及其葡萄业的发展历程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自己曾长期是那里重要的兼职劳动者，当然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者和调研者”。他自言，从到县城上初中到后来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从事全天农业劳动，干过绝大多数农活。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的家乡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有了亲身体会之后，又能跳出来，以一个研究者的角色，提炼出有意义的命题，运用自己所学并信服的理论工具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和剖析自己故乡的经济发展历程，解答自己提出的命题。因此他的研究既有严谨的理论探索和翔实的实证分析所产生的较强的说服力，又使人感到有血有肉，丰满厚重；读他的这本书，仿佛闻到了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泥土气息。

作者在讲完这个故事后，得出了他的结论：“总之，不依赖于龙头企业的带动，不通过正式农民合作组织，也没有政府的刻意扶植，一家一户分户经营的小农单凭自身的力量也完全可以演化出有竞争力的农业。然而，这一结论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第一，

政府应以提供公共物品为首要职责，并在城乡之间尽可能实现机会平等，切实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投入。第二，这一过程往往是长期的。任何地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主要是一个长期、渐进、累积和演化的进程，并非在短期内可以人为构建的。相关决策主体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模仿、学习、试错与创新。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技术的逐渐成熟，或是市场范围的扩展，无疑都需要时间。当然，政府职能和政府官员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基础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强化也需要时间。”

作者的这个故事真的讲完了吗？他在书中提到，“在葡萄种植技术的演化中，商业网络、关系网络和公共服务网络往往结合、混同在一起，难以明确区分”。他也提到，“所谓的合作，绝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注定的，更不是有意构建的，而是自然演化的。在本书所剖析的案例中，村民之间在葡萄种植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技术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非合作倾向，而在葡萄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逐渐演化为日益密切的合作倾向”。村民以后在与各种网络的互动中是否会与龙头企业发生更紧密的联系？村民的非正式合作是否会转化为正式的合作？作者的父老乡亲的经济活动将不断拓展，他们的创新精神也将传承延续，他讲的故事也远没有终结。

能讲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并不容易，把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讲好就更难了。我认为，徐振宇博士讲的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论述的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在讲故事时，层层剥茧，循序渐进，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文风活泼清新，可读性很强，把这个故事讲得相当精彩。衷心希望以后能够读到徐振宇博士更多的更有意思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晓山 研究员

2010年8月7日于北戴河

前 言

本书是2008年5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通过的论文。当它沉睡了两年之后，我意识到有必要让它正式问世。除改动一些打印错误并作了一些技术处理外，基本保持了博士论文的原貌，以反映当时的认知水平。

本书并非要鸿篇巨制地研究一个带有最终结论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要探索自己心中存在的一个“谜”，或曰命题。在定题之前，我的确有一番犹豫。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晓山研究员。张老师在开题阶段就推荐我认真阅读朱玲研究员和刘南平先生关于如何做研究和如何做博士论文的精彩文章，我读完之后才意识到，应该做什么类型的研究。在与张老师做了比较充分的沟通之后，我决心选一个看起来非常“小”的“题目”来作文章，“小”到甚至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还要“小”。因为费老的名著几乎涉及“江村”经济的方方面面，而本书只是研究一个村庄的一个产业的组织模式演化而已。

通过一个村庄的真实演化历程来剖析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梦想。反复阅读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后，我觉得我必须做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与此同

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以一个村庄为案例作博士学位论文，似乎向来都是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套路，极少有经济管理类博士生这样做。有一次，我在偶然中发现，著名学者霍珀（W. David Hopper）^①于1957年提交给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印度中北部某村庄的经济组织》竟然也是一篇以印度恒河平原的一个村庄（塞纳普尔村）为研究对象的。这篇文献早已成为农业经济学界的经典。为撰写博士论文，霍珀于1953年10月到1955年2月住在塞纳普尔村。霍珀于1957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70~1978年之间任著名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IDRC）首任主席。基于自身扎实的村庄调查经验，霍珀对一种广为流布的假说不以为然——贫穷国家（如印度）的小农（peasant farmers）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来自西方国家专家的有关改善其收成的建议。在霍珀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小农，而在于西方专家（其意见并不适合于印度的条件）。这一洞见奠定了指引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自1970年以来的战略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必须由他们自己作出回答，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角色就在于理解、支持并予以合作。以上观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其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它说出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观点，而恰恰是说出我们一直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我近些年来跟踪研究天星村发展的结果，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以上观点。

本书不仅是我多年来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观察一个普通村庄的结果，也是我长期切身体会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对所研究的村庄非常熟悉，有非常便利的研究条件。霍珀先生更是在印度的村庄住了一年多。与此相似，我对所研究

^① 其专业为农业经济学（agricultural economics）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的天星村及其葡萄业的发展历程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自己曾长期是那里重要的兼职劳动者，当然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者和调研者。

我就出生于天星村，就读的小学是天星村小学。正是在这个条件极为简陋的村小学，我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1989年，我离开天星村到县城求学，有幸就读于当时的湖北省重点中学（现已成为全国重点高中）——公安县第一中学。虽然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上这所中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的么爷爷（我爷爷的亲弟弟）未能在“文化大革命”前考上大学并任教于这所中学的话，我是不可能就读于此的（由于城乡分割体制，我将只能就读于乡镇中学）。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除了认真学习课本知识以外，还经常杞人忧天地思考有关农村发展的问题。1995年，我赴京求学。在大学一年级，也就是1996年春节假期，为完成学校布置的“社会调查”的任务，作为学经济的学生，我对天星村的土地、人口、产业、农民收入、村级财务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天星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1600元，与全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基本相当，与邻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也非常相近。这或许可以看做是我“研究”天星村发展的开始。

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却希望我和弟弟一定要读书成才，而且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父母要求我不论身在何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不论地位高低，一定不能忘本，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了农村和农民的疾苦。于是，初中、高中、大学。每年的寒暑假，我都和父母亲一起参加农田里的劳动，无论天晴还是下雨，无论酷暑还是严寒。现在想来，他（她）们的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让我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脱离农村和农业。第二，即使脱离了农村，也万万不可忘记农村、农业和农民。我

至今还记得只上过三年私塾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灌输给我的一句话——“君出于民，民出于土”。第三，适当帮助家庭分担过于繁重的农活（这显然与现在有些家长一心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他们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但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好。

实际上，从到县城上初中至后来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从事全天农业劳动，干过绝大多数农活——累的如挑水灌溉，脏的如挑大粪，危险的如喷农药，烦的如剥烂棉花桃，痒的如收割小麦，需要考验耐心的卖柑橘、卖西瓜、卖甘蔗、卖大白菜等。我割稻谷的速度绝不在大多数熟练农民之下，喷农药的速度、耐力和技术也堪比标准的农民。现在有些种水稻的农民的劳动强度可能还远远不及我中学时帮家里干的农活的强度，因为现在种水稻的大多数程序都通过机械作业来完成。因此，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我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毕竟我也长期从事过农业操作，长期住在农村，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每年都做几十天的“全日制”兼职农民。现在我仍然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调研。多年以来，我对农民之穷、农业之弱和农村之危，对农村基础设施之落后、农业政策之扭曲、流通效率之低、交易成本之高以及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失职、失聪、失策）等状况有深刻体认，并对“三农”问题有难以割舍的研究偏好——从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将农业经济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并在《中国农村观察》等期刊上发表过一些有关农产品流通与农业发展的论文，2002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论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界限——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实证分析》。以上研究中，相当一部分都以天星村为研究对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本人硕士学位论文和其他前期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其研究对象仍然是天星村，只是这一次的研究重点放在葡萄产业上。在相关研究

中，我逐渐养成一种习惯，尽可能从农民的角度去看待“三农”问题，虽然这种视角有可能被看成“小农”意识或带有个人感情和主观色彩，我还是要坚持这种视角。一种理论，一种政策，如果对于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困难、农民的行为特征都没有搞清楚，其有效性是可想而知的。在各种期刊、报纸、电视、网络等诸多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从城里人的视角去看待“三农”问题的文献，它们虽有“跳出农村看农村”的优势，但有的似乎蹦得太高、跳得太远，以至于经常得出诸如农民“闭塞”、“愚昧无知”、“保守”、“观念落后”等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并以此为前提去评论甚至去构建涉农政策。

我的母亲一生坎坷。她幼年丧父，中年丧夫。她出生于1950年代，很小就忍饥挨饿，至今仍对“粮食过渡”记忆犹新。更为不幸的是，1964年，我外公与世长辞，正在上小学的她不得不中断学业。与我的父母比起来，我要幸运得多。我虽有丧父之痛，但毕竟还是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我非常清楚，自己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父母拼命奋斗的结果（我的那些农村同学之中，不少人因承担不起较高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一个贫穷农家的子弟能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父母所要付出的艰辛是很多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父母的勤劳和坚强程度超乎常人，他们想改变自己及其后代命运的强烈愿望也超乎寻常。他们曾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每年种多达3公顷的地——几乎完全依靠人力。为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他们曾先后尝试种植过棉花、西瓜、梨、柑橘和葡萄等多种农作物。很多人都不明白我的父母为什么要如此“拼命”，但我非常清楚其中的缘由——他们不想让我和弟弟继续走他们走过的道路，于是即使自己付出再多也在所不惜。

父亲是1999年3月11日凌晨告别人世的。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脑部癌细胞的迅速扩散不能说话。得知我免试保

送本校硕士研究生，好几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他竟然还高兴地说了声“好”！在父亲远行前的几个月，我曾请假陪伴其左右。当时正值天星村葡萄产业发展最为艰难的时刻，不少农户开始砍树改种其他农作物。尽管他临终前非常痛苦，但是他还在关注着葡萄业的发展。今天，天星村的葡萄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大多数村民都走上了富裕之路。父亲亲手栽培的柑橘、橙子、柚子、葡萄都已成林并大获丰收。虽然物是人非，但愿他含笑九泉。在他远行 11 周年之后，谨以此书纪念我睿智、勤劳但不幸英年早逝的父亲。

徐振宇

2008 年 5 月于北京回龙观寓所

2010 年 5 月修改于北京回龙观寓所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 peasants and big market, th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ree main organizational models: cooperatives, contract farming, and agribusiness. As a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existing theory, this paper works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s it possible for individual peasants to develop and evolve into a competitive agriculture on their own,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leading compan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The author takes the evolution of grape industry in Tian Xing Village, an ordinary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middle part of PRC,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vides a positive but conditional answer for the question mentioned above. Besid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pontaneous, totally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model which is ignored by most of the scholars. In this model, a competitive industry was evolved almost entirely through individual peasants' own initia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within the evolution of such organizational model operated by individual peasants, especially the type of mechanism related to the start of grape industry,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scope,

and the evolution of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played a vital role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pe industry. Around 1990s in Tian Xing Village, there happened to be a handful of villagers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y entered the grape industry by chance. It was their endless innovations and continuous trial and error that made the grape industry an emergence in the village. It was the imitation and learning by households that enabled the grape industry to grow larger. And it was the necessary barriers to entry and isolating mechanisms that helped the industry to thr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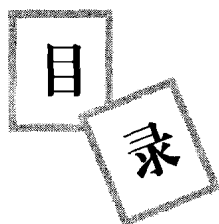
During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n grape industry, individual peasants successfully accelerated the inter-regional transfer of general technology through the business network. They also realized the diffusion of techniques within the region using a variety of Guan-Xi network, such as friendship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y accomplished the localization of farming techniques through their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experiments, the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among individual peasants, and through the “learning by doing”, spillover of knowledge and trial and error mechanism. With the help of “following-imitating-learning” mechanisms, technological paradigm was diversified and the rivalry among individual peasants was largely weakened. The mechanisms were favoura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so as to launch the competition at a larger scal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 mainly composed of individual peasants with the basic feature of sufficient competition,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is highly efficien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pe. The key reason lies in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market scope. Although it is improper to understat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real heroes that made all these things possible are the small number of farmers who possessed

entrepreneurship and determination to tap the market.

In summary, a competitive agriculture can be evolved from individual peasants themselv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leading companies, the formal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ntion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However,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TWO prerequisites. First of all,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public good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from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Government must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basic edu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Secondly, this whole process of evolution will be 'a long-term one. The development of any industry in any region is generally a long-term, progressive, accumulative and evolving process on a gradual basis, which cannot be constructed by will within a short period. It takes long time for the related decision-making agents to keep imitating, learning, trial and error, and innovation.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the rearrang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technology, or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scope, all need time. It certainly takes time to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role and the notion of officials. It also takes time to improve the basic edu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Key Words] Grape Industry; Organization; Evolution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001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001
二 选题意义	010
第二节 基本问题与基本假设	013
一 基本问题	013
二 基本假设	013
第三节 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017
一 基本概念界定	017
二 研究对象界定	020
三 计量单位界定	025
第四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025
一 方法论与理论基础	025
二 主要研究方法	031
三 主要资料来源	040
第二章 天星村：社区概况与发展背景	045
第一节 天星村及所在地区的基本情况	045